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两河流域的海洋贸易

刘昌玉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省、金华市, 321004)

摘要: 西亚的两河流域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站点。在汉朝丝绸之路开辟以前, 以西亚两河流域地区为中心, 就已经存在了若干条商业贸易路线和发达的国际贸易商路网络。两河流域的南部被称为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被认为是古代的贸易国家, 可与古典时期的希腊相媲美。巴比伦尼亚这一名字源自于“贸易”。由于缺乏矿产与木材等自然资源, 两河流域依赖于对外贸易, 从外部世界获取所缺的资源。

关键词: 两河流域; 海洋贸易; 乌尔第三王朝

中图分类号: K1 **文献标识码:** A

在两河流域王室铭文中, 统治者往往自诩为恢复了对外贸易和商路。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 两河流域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波斯湾。乌尔第三王朝建立者乌尔那穆自称恢复了波斯湾海上贸易。例如, 乌尔纳姆的铭文(UET I 50)记载了对外贸易中心由之前的吉尔苏(拉伽什)转到乌尔。在《乌尔纳姆法典》中提到了贸易问题的重要性(143-149行), “他制定了青铜希拉容量单位。他标准化米纳重量单位。他标准化白银和石头舍客勒与米纳单位的关系。”统一度量衡促进了贸易发展。同时, 贸易发展也与军事扩张有关。乌尔那穆的继承人舒尔吉效仿前朝先例, 自称为神以及“四方之王”, 他将波斯湾的狄勒蒙纳入到王朝的势力范围, 并且与狄勒蒙互派使者(文献AO 3474)。

乌尔第三王朝海上贸易研究是亚述学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诸多学者依据考古发掘成果以及楔形文字文献证据, 探讨波斯湾沿岸的狄勒蒙、马干以及印度河流域的麦鲁哈等国家与乌尔第三王朝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历史变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基于楔形文字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成果, 试图从狄勒蒙、马干、麦鲁哈三个重要贸易站点出发来系统探析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海上贸易活动。

一、狄勒蒙

狄勒蒙位于今巴林岛, 一说也包括今科威特的法拉卡岛(Failaka)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塔鲁特岛(Tarut)等地区。在早王朝时期, 狄勒蒙文化主要集中于塔鲁特岛, 且已经成为波斯湾贸易的中心。狄勒蒙最早出现于约公元前2500年早王朝IIIa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中。注意, 在更早的乌鲁克文化III期(约公元前3200年)的文献中, 提到了ZAG.DILMUN和GIN₂:DILMUN的术语, 目前学术界不清楚它们是否指的是狄勒蒙地名。在拉伽什城邦首领乌尔南舍的铭文中, 他自称制造了狄勒蒙船, 从狄勒蒙为他运输商品。两河流域的商人从狄勒蒙进口铜和锡等贵重金属, 出口的商品包括大麦、二粒小麦、雪松树脂、植物油、动物油脂、纺织品, 通常以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从文献记载推知, 在早王朝时期, 两河流域从事的波斯湾贸易仅限于狄勒蒙, 以塔鲁特岛为主要的贸易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 狄勒蒙依然以塔鲁特岛为中心, 据考古证据显示, 塔鲁特岛作为马尔哈西商品出口至两河流域的海上贸易重要中转站。据文献证据记载, 随着萨尔贡对外扩张政策的推荐, 阿卡德王国的势力范围达到了“从上海(地中海)到下海(波斯湾)”的广大范围, 并且影响波及到马干、马尔哈西和麦鲁哈等遥远之地。阿卡德王国灭亡后, 两河流域北部被库提人占据, 成立库提王国。在库提人统治下, 两河流域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暂时中断, 据当时铭文记载, “在北部, 他(库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早期两河流域契约文书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 23JZD040)阶段性成果。

提人)关闭了商路,使得国家的道路上杂草丛生。”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在两河流域文献中几乎很少有关于狄勒蒙的记载。有的学者认为,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之所以较少记载狄勒蒙,是因为此时狄勒蒙被合并到乌尔第三王朝版图,尤其是位于今科威特的法拉卡岛,学者们提出了两个证据,一个是舒尔吉 34 年的一篇信件提到“我的主人,您已给我关于每件事的指示,从海上和狄勒蒙之地到西穆卢姆边界。”表明狄勒蒙合并入舒尔吉的王国中。另一个证据是阿马尔辛 1 年的经济文献中提到“马干的恩西”。但是从考古和文献证据来看,乌尔王国的商人与狄勒蒙之间的贸易活动则更加有组织性和进行大宗贸易。即使两河流域商人可以直接航行至更远的马干等地直接贸易,狄勒蒙也依然作为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随着拉伽什-吉尔苏行省的海港城市古阿巴港口的发展以及造船技术的进步(“大船”的制造),乌尔王国已经具备远航的条件,这也导致了原先狄勒蒙中转站地位的下降。关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狄勒蒙商业地位的衰落,可能是由于阿摩利人的介入。据古气象学家研究证明,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波斯湾沿岸遭遇极端干旱气候,这对贸易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又称“4.2千年事件”)。此外,狄勒蒙的中心从塔鲁特岛转移到巴林岛,并且形成了城市国家的建构(大约公元前2050年)。据考古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巴林岛大约有1万人口,整个狄勒蒙文化圈大约有2万人口。狄勒蒙社会由若干个家族构成,每个家族拥有一定的自治权,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狄勒蒙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今科威特法拉卡岛,也开始作为波斯湾贸易据点发展起来。在该遗址,考古发现了许多来自马干和麦鲁哈的物件,以及来自于乌尔王国的滚筒印章。有的学者认为,法拉卡岛很可能是作为乌尔王国从事波斯湾贸易的一个重要驿站。

舒辛统治时期,其最高行政首脑阿拉德南那(Arad-Nanna sukkal-mah)有一个头衔是狄勒蒙行政长官(gir nita),表明了乌尔王朝对狄勒蒙的政治影响力。从乌尔出土的泥板(ITT 2 776)提到羊毛出口至狄勒蒙。苏美尔文献中提到的许多狄勒蒙商品,其原产地不在狄勒蒙,而在印度河流域或阿富汗,这说明狄勒蒙作为一个贸易中转港和集散中心,连接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的长途贸易。这时期来自狄勒蒙的朝贡品也被运到两河流域的神庙中,作为神庙税收组成部分,两河流域专门派遣使者或贸易代表到狄勒蒙去。据文献记载(UET 5 286),神庙纳税者是伊丁宁因扎克(Idin-Nin-inzak),这是一个狄勒蒙人名,说明此时来自狄勒蒙的水手或商人航海到达乌尔。

二、马干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干位于阿曼半岛(今阿曼和阿联酋)。在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提到了一个“大马干”(Ma₂-gan^{ki} gu-la, 见文献UET 3 1193)的地理含义,可能指的是广义上的马干概念,至整个阿曼半岛(亦包括也门)以及伊朗西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地区(今伊朗的霍尔木兹甘省)。以伊朗西南部的马干地区作为中转站,沟通两河流域与马尔哈西和麦鲁哈等地区的贸易往来。在政体上,马干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政权,而是由若干小的、分散的部落组成的联盟,没有一位强大的首领。但是,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在阿卡德王国时期,马干已经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地域性国家。笔者认为,至少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马干作为一个统一的政体,其统治者在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被称为“国王”(lugal, 有时亦称“恩西”ensi₂, 公侯)。例如,据舒尔吉时期的文献记载,一位匿名的马干国王发送了一个黄金制品给舒尔吉作为外交礼物(文献UET 3 299)。另据阿马尔辛时期的文献记载,一位名叫纳杜卜埃里(Nadub'el-i)的马干恩西派了使节出访乌尔。

最早记载马干的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出现在阿卡德王国时期。在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的波斯湾贸易仅限于狄勒蒙，虽然考古证据显示这一时期马干可能受到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但是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马干和麦鲁哈的记载。不过，可以推断，这一时期两河流域与马干之间至少存在间接联系，在其中狄勒蒙商人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狄勒蒙商人购买马干产的铜，以及从马尔哈西（伊朗东南部）和麦鲁哈（印度河流域）运输到马干的青金石、红玉髓、黄金等。有据可考的马干与两河流域直接联系最早出现于阿卡德王国时期。据萨尔贡的王室铭文记载，“麦鲁哈、马干和狄勒蒙的船停泊在阿卡德港口。”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马干取代狄勒蒙和麦鲁哈，成为波斯湾贸易的主角，仅次于两河流域在波斯湾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麦鲁哈和狄勒蒙在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很少出现。马尔哈西与马干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密切的联系。较之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的波斯湾贸易的主要不同是，波斯湾贸易更加由两河流域所支配。

乌尔第三王朝的波斯湾贸易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以古阿巴港口为起点，沿波斯湾南岸航行，中途经停狄勒蒙等地区，最终达到目的地马干。另一条也是以古阿巴为起点，沿波斯湾北岸航行，到达卡伦河（Karun）河口沿岸，然后由海运转河运，沿卡伦河而上，到达苏萨和阿丹顿等地区。从两河流域出口的商品包括大麦、纺织品、羊毛和植物油，从马干进口的商品有铜和闪长岩，从麦鲁哈和伊朗地区进口的商品有红玉髓、青金石、绿泥石等石材或制品，以及黄金、锡、象牙、红树木、黄檀木、黑檀木和竹子等（文献AUCT 2 289）。

在乌尔纳姆时期文献还记载马干船到达两河流域港口。据乌尔纳姆的王室铭文记载，他宣称“已经将马干的船驶回了南那神（即乌尔城）”，以及“使海上贸易在海边繁荣。”但是乌尔纳姆之后的乌尔第三王朝文献中不再有类似的记载。乌尔王国在东方的盟友除了马尔哈西和安珊之外，还有波斯湾沿岸的马干。两国最早的外交证据是舒尔吉28年，马干统治者发送一个黄金礼物给乌尔（文献UET 3 299）。马干与乌尔王国之间有着友好的外交关系，通过商业贸易合作与军事结盟来达成这些外交关系。很可能，马干也与马尔哈西结盟。马干作为沟通两河流域与马尔哈西及其更东北地区的中转站。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阿摩利人移民到马干和波斯湾其他地区，他们很快定居于此，并且逐渐被同化。例如，马干的统治者或使节纳杜卜埃里和威杜姆都拥有阿摩利语名字。在普兹瑞什达干文献中记载了，动物被支出给“阿摩利人（和）来自狄勒蒙的驱魔师（文献RA 5 93 AO 3474）。”据乌尔第三王朝第四王舒辛时期文献记载，从吉尔苏出口大麦至马干。最后一王伊比辛时期，来自乌尔的经济文献有大量关于外国商品的记录，在卢恩利拉官员档案中，有大量乌尔与马干铜贸易的记录。乌尔第三王朝的波斯湾贸易考古证据相对稀少，青金石可能不从波斯湾运到两河流域，而是跨过伊朗高原从陆路到达两河流域。马干很可能在与麦鲁哈的贸易中占有先手，即马干商队驶往麦鲁哈港口从事贸易活动。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商人从事波斯湾贸易，受乌尔国家的对外贸易官方机构所控制，该机构由一个名叫普乌杜的商人负责管理，其管辖的包括：8个“大船”军尉以及6个“六十人组督办官”。据此推测，普乌杜至少能够管理360人。普乌杜的机构总部在拉伽什-吉尔苏行省的海港城市古阿巴。据一篇文献（BPOA 6 37）记载，在拉伽什-吉尔苏行省有一支由223艘船组成的国家船队，这些船大多是60古尔（约18000升）容量的船，还有11艘180古尔（约54000升）的大船，很可能是从事波斯湾贸易的船队。普乌杜家族在乌尔第三王朝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儿子库南那娶了乌尔的公主，与乌尔王室联姻，另一个儿子卢恩利拉（Lu-Enlila）也参与波斯湾贸易，并且最后接替其父普乌杜，管理乌尔王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卢恩利拉的头衔是“航海商人”，另一个头衔是王室法官。

以粮食出口为例，两河流域出口到马干的大麦的量是巨大的。例如，普乌杜被委派运送到马干600古尔大麦，甚至更多（文献ITT 2 776）。其子卢恩利拉发送到马干1800古尔大麦，大约需要10艘容量为180古尔的大船才能运输。两河流域出口到马干的另一项大宗产品是纺织品，这些纺织品是在古阿巴的加工场生产，这里是乌尔王国最大的纺织品生产中心，大约雇佣有1万名纺织工进行工作，大多数是女工。波斯湾商品进口到两河流域，需要缴纳关税，被称为“海上贸易什一税”，缴纳给乌尔城的南那和宁伽尔神庙（文献UET 3 341）。

乌尔第三王朝重新开展了自阿卡德王国之后一度暂停的波斯湾贸易，并且其商业政策体现了更加强烈的国家参与精神。贸易网络的建立，是以军事支撑为保障，并且主要依赖于外交联系。

三、麦鲁哈

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所记载的异域地名“麦鲁哈”（me-luh-ha），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代不同的地理位置。“麦鲁哈”在公元前三千纪大概指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一千纪中后期指的是东非。麦鲁哈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迁。有学者对麦鲁哈地名变迁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麦鲁哈自始至终都是位于非洲，还将me-luh-ha与古埃及努比亚的一个部落名称迈扎（Medja）等同，他的这一理论目前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麦鲁哈”这个地名只出现在古代近东的楔形文字文献中，在古埃及象形文字文献、古希腊文学以及圣经文献等其他文献中并没有出现。

麦鲁哈这一地名最早见于阿卡德王朝的楔形文字文献中，主要包括王室铭文、滚印铭文、文学作品和经济文献。阿卡德王朝建立者萨尔贡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王室铭文提到：“萨尔贡，世界之王，取得了34次战役的胜利。他摧毁了城墙，势力到达海岸。他使来自麦鲁哈、马干和狄勒蒙的船停泊在阿卡德的港口。”萨尔贡统治时期有来自麦鲁哈的船，说明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麦鲁哈）之间的贸易繁荣，二者之间的贸易可能在更早时期就开始了。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所以两河流域与麦鲁哈之间的贸易往来离不开翻译人员。阿卡德时期的一个滚印铭文，记载了一个叫舒伊利苏的人，他的身份是麦鲁哈的翻译员，他很可能既懂麦鲁哈语、又懂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麦鲁哈翻译人员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阿卡德王朝与印度河流域的往来。在阿卡德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麦鲁哈的记载。据《阿卡德之咒》记载，在纳拉姆辛时期，来自“黑山”的麦鲁哈人为伊南娜女神带来了猴子、大象、水牛等外来动物以及各种奇珍异宝。除此，阿卡德时期的经济文献中有不少关于麦鲁哈的记录，但只是简单的人名和地名，信息量极少，主要来自于阿达布遗址，其中许多文献记录了“麦鲁哈船”，包括许多物品被带上麦鲁哈船，支付给麦鲁哈船的船长和船员等信息（文献Adab 712）。麦鲁哈船的记载，表明了麦鲁哈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频繁。

阿卡德王朝被库提人灭亡后，两河流域历史陷入分裂，库提人大概只统治了两河流域北部地区，南部的苏美尔城邦趁机独立，以拉伽什第二王朝最为著名，因其最有名的统治者名叫古地亚，该王朝又称古地亚王朝。据《古地亚滚筒铭文》记载，古地亚从麦鲁哈进口大量建筑材料和珍贵物品。虽然文献中没有关于钱财支付的记载，但是这些物品可能不是战利品或外国贡品。据古地亚雕像铭文 B 记载：“从麦鲁哈山，他（古地亚）带下来闪长岩，用它为宁吉尔苏神建筑（神像），他带下来石块，用它们为宁吉尔苏神制造三头狮权杖。他从麦鲁哈山的金矿带下来黄金，用它为宁吉尔苏神制造剑鞘。”这两篇铭文至少包括以下信息：麦鲁哈是闪长岩、木材、黄金的产地或来源地，麦鲁哈与马干、古宾和狄勒蒙处于同一贸易路线，至少位于两河流域的同侧。著名的古地亚滚筒铭文记载了来自麦鲁哈的红玉髓。

在乌尔第三王朝，麦鲁哈地名几乎从文献记录中消失，表明麦鲁哈已经中止了与两河流

域的直接没有往来。虽然有一些麦鲁哈来源的商品见于乌尔第三王朝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是经济文献，其中关于麦鲁哈的记录主要来自吉尔苏和乌尔的文献，此外还有少量来自温马和伊利萨格里格的文献，但是不再有关于麦鲁哈船到达两河流域的记载，甚至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麦鲁哈商人继续活跃于波斯湾贸易中。麦鲁哈的商品可能只运输到马干，再经马干的中转作用，转运到两河流域等地。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的海上贸易由直接贸易转为间接贸易，位于波斯湾巴林岛的狄勒蒙成为二者贸易的纽带。乌尔第三王朝在时间上大致对应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晚期，可能随着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亡，它与两河流域长达几百年的直接海上贸易往来突然中断。当然少数证据表明，有限的海上贸易依然保持，主要分布在今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这里可能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余晖。虽然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麦鲁哈中断了与两河流域的直接海上贸易，但是麦鲁哈和麦鲁哈民族并没有从楔形文字文献中彻底消失。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尔第三王朝，许多来自印度河流域的麦鲁哈人渐渐地在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居住在吉尔苏-拉伽什行省下设港口城市古阿巴的一个村庄里，这个村庄被称为“麦鲁哈村庄”，是麦鲁哈人及其后裔的定居点，他们起了苏美尔语的名字，甚至会说苏美尔语。麦鲁哈村庄大约存在了45年，村庄内还设有专门的粮仓，作为吉尔苏行省大麦的重要生产地和供货地，是行省和国家税收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大麦作为工资支付给工匠和其他服务人员，保证了国家财政与薪酬制度的完善。除了麦鲁哈村庄和粮仓的记载外，在楔形文字文献中还记载了一个“麦鲁哈花园”（文献STA 19），盛产各类水果花卉，作为献给吉尔苏女神宁玛尔的贡品，麦鲁哈花园隶属于宁玛尔神庙，它的出现表明了麦鲁哈人开始信仰两河流域的神灵，是麦鲁哈人“苏美尔化”的重要体现。此外，许多麦鲁哈人自己或者为子孙起了苏美尔语名字（文献OBTR 242）。作为两河流域的新移民，麦鲁哈人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逐渐消失了原有的民族性，加速了与苏美尔民族的融合及同化过程，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麦鲁哈的苏美尔化”。上述关于麦鲁哈村庄、麦鲁哈粮仓、麦鲁哈花园，以及带有苏美尔语人名的麦鲁哈人的记载，均出自乌尔第三王朝吉尔苏行省文献。在乌尔第三王朝其他地点出土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麦鲁哈的其他不同记载。

在乌尔出土的文献中，记载有麦鲁哈的物产，主要见于乌尔第三王朝末王伊比辛统治的第15年，这些物产包括：红树木（文献UET 3 752）、黄檀木（文献UET 3 818）、黑鹈鹕（文献UET 3 770）、黄铜（文献UET 3 368）等。是否到了乌尔第三王朝，麦鲁哈与两河流域之间的直接贸易联系中断了呢？据一篇来自乌玛的经济文献记载，一个名叫乌图伊拉特的信使去麦鲁哈，接收了纺织品（文献CM 26 136）。另一篇伊利萨格里格文献（Nisaba 15 371）记载，三个“麦鲁哈人”（纳纳扎、萨马尔和阿里阿希）接收乌尔王室赠送的芝麻油，说明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还有人员往来。麦鲁哈作为印度洋-波斯湾贸易的最东端和起点，不仅直接出口本地物产，还在阿富汗的绍图盖伊建立商业居民点，垄断青金石和锡矿等珍贵资源，并转手出口到两河流域，赚取高额利润。

除了经济文献之外，乌尔第三王朝的王室铭文也有关于麦鲁哈的零星记录。在伊比辛统治时期，一只像“有斑点的麦鲁哈狗”的雕刻品作为献给月神南那的供品，从马尔哈西被带到乌尔（文献RIME 3/2.01.05.04）。而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文学作品中，有关麦鲁哈的记载延续了前期的描述。据《舒尔吉赞美诗》记载，麦鲁哈被描绘为“黑色之山”或“黑人之地”，这与古地亚时期的描述是一致的。此外，该作品还提到，舒尔吉很有语言天赋，会多种外语，其中包括来自麦鲁哈黑人之地的语言。这一时期，包括麦鲁哈移民在内的两河流域人们逐渐遗忘了麦鲁哈的地理位置，对麦鲁哈的文化记忆愈加模糊。

结语

公元前2004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两河流域与麦鲁哈的直接海上国际贸易中止，转为间接贸易，即需要通过狄勒蒙的中转站，狄勒蒙在这条贸易路线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过狄勒蒙的辉煌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从大约公元前1800年开始，由于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并最终灭亡，加上两河流域政治重心由南部转到北部，巴比伦和亚述的地位日益突出，昔日繁荣的波斯湾-印度洋海上国际贸易不久后终止。

两河流域地区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不仅缺乏石材、金属等矿藏资源，也缺乏大型木材，两河平原为灌溉平原，农业和畜牧业发达，盛产小麦、大麦、椰枣、无花果等农作物，以及牛羊等牲畜，正是由于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自远古开始，两河流域人们不得不与外界进行物品交易，从周围进口自然资源，这是两河流域乃至整个近东地区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这就自然形成了商品流通和贸易的产生。自大约公元前7千纪的史前时代至公元前2千纪晚期，亚洲西段的跨区域贸易以和平贸易为主，辅之以战争征服所获战利品。在文字发明之前的史前时代，考古发现和遗迹成为认识当时贸易的唯一手段，自楔形文字被发明之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一同成为我们复原当时贸易的重要依据。

古代两河流域商路和贸易起源于公元前7千纪的史前时代的黑曜石贸易，经乌鲁克文化时期的“世界体系”贸易，到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海上波斯湾贸易、陆上伊朗高原贸易为典型的国际跨区域贸易体系，又到古巴比伦-古亚述、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的围绕两河流域东西北各线贸易的总体框架结构的建立，最后到新亚述时期的亚述御道、波斯帝国的波斯御道的帝国体系框架下的机构有组织多功能商路贸易体系的运转，及其后来与丝绸之路西线的历史性“重合”，也为上古世界贸易画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之后开启了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的中古世界贸易体系。

参考文献

- [1] 刘昌玉：《从“上海”到下海：早期两河流域商路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 [2] 刘昌玉：《从印度到东非：古代两河流域文献中的“麦鲁哈”地名变迁探析》，《史林》2021年第6期。
- [3] 刘健：《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对海湾政策的演变和调整》，《史林》2021年第6期。
- [4] 刘昌玉：《排斥还是认同：库提人、阿摩利人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5期。
- [5] 刘昌玉：《上古时期东地中海贸易活动探析》，《外国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 [6] 国洪更、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和巴林的海上国际贸易——楔形文字文献和考古发现中的狄勒蒙》，《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
- [7] 刘昌玉：《丝绸之路开辟前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跨区域贸易探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 [8] 刘昌玉：《麦鲁哈与上古印度洋—波斯湾海上贸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9] 王献华：《早期城市与南部两河流域湾区文明》，《世界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
- [10] 刘昌玉、卞晓宇：《丝绸之路开辟前亚洲西端青金石商路探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Mesopotamian Maritime Trade in the Late Third Millennium BC

Liu Changyu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he Mesopotamia in West Asia was an important trading stop on the Silk Road.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were already several commercial trade routes and a well-developed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e network centered on Mesopotamia in West Asia. The southern Mesopotamia is called Babylonia. The name Babylonia originated from "trade". Due to the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minerals and timber, Mesopotamia relies on foreign trade to obtain the scarce resourc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Keywords: Mesopotamia; Maritime Trade; Ur III Dynasty